

电梯安全怎么重视都不过分

汤嘉琛

今日论语

湖北荆州发生电梯“吃人”事故后,类似事件仿佛突然之间多了很多。最新案例发生在上海长宁龙之梦商场:8月1日,一名保洁工在清理自动扶梯时左小腿被卡住,最终因伤势过重被截肢。目前,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,但这起事故为拥有20万部电梯的上海敲响了警钟:电梯安全隐患不可小觑。

龙之梦商场的监控录像记录了事件全过程,但更多细节和疑问有待调查结果揭开。比如,商场称事故源于保洁工为偷懒而违规操作,但商场员工称公司没有培训且

没有配备专用设备;再比如,商场称保洁工被夹后扶梯即刻自动停止运行,但伤者称直到自己按下紧急按钮才停……真相涉及责任认定,必须有详实调查。

电梯事故发生后,市民最关心的是:乘坐电梯到底还安不安全?作为电梯保有量最大的城市,上海在保障电梯安全方面的工作总体是比较到位的。比如,荆州电梯事故之后,上海就立即开展了隐患排查工作。而据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介绍,上海全市电梯故障率在万分之二到万分三之间,远低于汽车的故障率。

不过,对于电梯安全,再怎么重视,强调也不过分。前不久,在新民晚报“夏令热线”的“区长面对面”节目

中,杨浦区区长谢坚钢接到市民投诉称,文化花园一部电梯存在“带病工作”问题,经查发现该小区内竟有49台电梯存在质量隐患。这提醒我们,排查电梯安全隐患的工作还可以做得更细,尤其要注意老旧电梯。

电梯日常维保方面的问题要高度重视。据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介绍,“目前有超过八成的电梯故障是维保问题而导致的”。维保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其一,专业维保人员缺口大,全市仅有5000人;其二,不少电梯业主或物业业为省钱,常常“不坏不保养”;其三,监管工作落实不够到位。

每一起电梯安全事故,都是一记警钟,也是一次除险排患的契

机。只要发现安全漏洞,就要及时堵上。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城市,很多市民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电梯,这就要求有关各方务必将电梯安全隐患降到最低。无论是小区、写字楼还是商场、车站,凡是有电梯的地方,都要确保设备质量过硬、维保工作到位。

与此同时,职能部门还要以更严格、规范的监管,让市民吃下安心丸。电梯安全监管事关群众性命,职能部门要构建更健全的监管体系,做到“技防”与“人防”结合,常规监管与集中整治结合,不留死角和盲区。今年4月,《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》已正式实施,确保相关规定能落地、落实,应成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。

新民随笔

“夏令热线”的意义

晏秋秋

市委书记韩正,今年夏天“暗访”申城城市管理。不打招呼,轻车简从,知真情、知实情。用他的话说:“全市各级领导干部,必须改进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。”

韩正曾7次到访本报“夏令热线”,接听百姓来电。有一年他来接听电话,强调10个字:把实事办好,把好事办实。按我的理解,民生小事,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大事。“实”与“好”,是判断民生工作的两大标准。不钻研,不了解,就“实”不下去。不知情,不动情,就“好”不起来。

今年的“夏令热线”,本报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手,继续为上海17位区县提供知民情的平台——“区长面对面”大型访谈。至今接电的16名正职区县长,在听到一线百姓的诉求之后,或惊讶、或动怒、或自信、或纠结,都表示“很有收获”。而在一旁记录的记者,则深深感受到,上海这样一座大城市,情况实在是千差万别。不了解情况,不体察民情,简单“一刀切”的工作方法,必然实事做不好,好事做不实。

接下去,市水务、交通、城管、市容绿化四大系统的负责人,也将按多年惯例,一一亮相“夏令热线”,倾听一线百姓呼声。一名多年接听“夏令热线”的局长感慨:“每年接听热线,感觉上是和一年工作在‘对表’。自己工作的感受,和老百姓对你的工作的感受,是否一样,有没有偏差,通过热线很容易听出来。”

我想,“夏令热线”的意义,在于为百姓,提供“吐槽”的渠道;为政府,提供“原生态”的民情。这就是本报“夏令热线”23年来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。“夏令热线”是一个开放的平台,只要你愿意倾听,我们就提供百姓诉求“大数据”!

啰嗦一句。根据市领导的意见,“夏令热线”之后,本报还将持续关注上海其他民生话题,邀请多名局长到12319热线接听电话。读者诸君,敬请期待!

立法者要善于捕捉人心经验

权威声音

不久前,中国人大网公布了刑法修正案(九)草案二次审议稿。每一位社会公众都可以通过相应途径提出意见,这是民主立法、科学立法的体现,也意味着中国立法更加重视公众意见和背后的人心经验。

此前,关于刑法修正案(九)草案的讨论,多集中在拐卖儿童罪。所谓“人贩子一律死刑”的话题,大有全民参与之势。随后,草案二审稿的相关

修改,被媒体解读为“收买儿童,一律入刑”,迎来一片叫好。之所以如此,主要是由于在一般人尤其是受害家庭的内心,尽管有些收买儿童的人不以出卖为目的,但同样算得上“人贩”。如果立法者不予回应,很难称得上是合于时代、贴合人心的立法。

立法者首先要意识到,法律有先天的滞后性,变革时代的法律尤其有自身局限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,在拐卖儿童案件中无法适用精神损害赔偿,法律对儿童的保护就显得不够,未能抚慰当事人及其家

庭的伦理痛苦。这是需要立法者予以体察的。立法不仅仅事规则体系的建立,还要能够安顿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,回应人心所向、修补人世秩序之缺。

因此,转型中国的立法者,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,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。如此,才能使法律有可能承载特定的伦理理想,为当下的中国人找到心仪的生活秩序及其法权安排。(张国旺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新民新语

当停车位有了性别

曹刚

近日,成都一处高速服务区新添4个女士车位,比正常车位宽50厘米。两个多月前,上海兴义路一商务楼地下车库内也设计过4个加宽的女性专属车位,类似车位在合肥、长沙、大连都曾现身。

女性车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德国,建立初衷不是为了降低停车难度,而是为了提高安全系数——照明好,离出口近,配有摄像头,能减小女性遭到骚扰或侵犯的概率。

如今,关键特色走了样,“安全”车位被简化成了“宽敞”车位。从表面上看,为女司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,相信这也是设计者美好的出发点。可是,不少女同胞却不买账,见到专属车位便不假思索地问:“你的意思是我们女人开车技术不如男人咯?”

设置女性车位的基本逻辑是:女司机车技相对较差,所以应该设立一种更宽敞的车位,照顾她们。

女性不善于开车,是大众对女司机的刻板印象,缺乏足够数据支撑,甚至还有调查显示,女司机事故率比男司机低。当然,这也不能证明她们技术更好,车技与事故本无必然联系。但“加大版”女性车位的出现,认可并加固了已有的刻板印象,继而加深了偏见。

类似的刻板印象还有:女生英语有优势,男生数理化更牛。如果以此为由,设男女两个版本的考卷,难易不同,是否合理?

同样加宽了的残疾人车位,和同样为女士设计的专用地铁车厢,与女性车位的设置逻辑都不同。

残疾人车位之所以大,是因为他们行动不便,上下车需要更大空间,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停车水平差。女士专用车厢之所以合理,是因为女性更易受到骚扰,先天力量更弱,这两点显而易见。而开车就是一项熟能生巧的技术活,只有熟练和不熟练之分,没有性别之分,女司机不是“车技差”的代名词。

提供宽敞车位,挺好,但没必要刻意强调性别。大车位应向所有停车技术欠佳的人开放,无论新手、老人还是女性。好端端一个“菜鸟车位”,为啥非要贴上性别标签?



微信赌徒

『微信上抢红包,谁知游戏变圈套。一掷千金输红眼,庄家抽成赚个饱。二十三岁的焦某是温州瓯海人,今年三月初组建一个微信群,并逐渐将其变为一个微信赌场。据警方介绍,焦某每天可以赚取四千至六千元的抽成,焦某一人就收到红包六万四千五百九十四次,金额达二百五十九点四万余元。 孺子牛画』

网视舆情

“嫁给大山的女人”郜艳敏最近又成为焦点人物,之所以说“又”,是因为有关她的种种经历几年前媒体已经进行了报道,而这一次之所以再次被聚焦,无外乎因为她的被拐卖经历,以及她所受到诸多赞誉。地方对于这样一位曾经遭遇不幸的代课老师,不是通过相应的途径去惩罚那些犯罪人,而是选择性地忽视这一层背景,转而突出其代课经历所表现的“最美”一面,很多人无法接受这种做法。如何惩罚拐卖人口这类犯罪现象,对于郜艳敏又该采取何种救助,问题的复杂性再次得以呈现。

很多人主张惩罚犯罪分子,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也在其微博上表达了类似的态度。外界认为,对于郜艳敏本人而言,过去的经历不堪回首,如果她的这段经历不被还

原,犯罪分子得不到惩罚,那么,郜艳敏“最美”的光环也会变质,甚至可能导致一种反讽。这样的呼吁不难理解,但奇怪的是,自郜艳敏被曝光后,地方在惩罚犯罪分子方面鲜有作为,对于前来采访郜艳敏的媒体也是大加阻挠。这看起来是地方惯用的维稳手段,但出人意料的是,郜艳敏本人也表现出安于现状的态度,对于过去的那段经历不愿再提起,她只是希望过着安稳的生活,对于自己的家人以及犯罪分子未表现出外界期待的苛责态度。

为什么会这样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,当事人发声后,舆论对郜艳敏的讨论越来越深入,人们的表态陷入两难:一方面是罪不可赦的拐卖人口

犯罪行为,有心的读者或许记得,前一段时间舆论一度掀起“对人口贩子一律死刑”的呼吁,学界对此虽有深入的辩论,但从这种呼吁不难看出人们对拐卖人口的行为持宽容态度;另一方面是郜艳敏眼下的生活,有着犯罪嫌疑的家人是她的亲人,她不会忘记自己被拐卖的经历,但今非昔比,她只能承认并接受现状,选择性地忽视过去那段不堪经历,今天看地方政府没有像外界期待的那样惩罚犯罪分子,这似乎也间接反映了郜艳敏本人的态度。

不过,外界不会因为郜艳敏的表态而打消疑虑,当地方种种不是得以曝光,这其中不仅包括对人口贩子的态度,也包括地方政府在教育

领域的种种欠账,舆论不乏苛责,这些都不是事件中的核心议题,但通过对它们的关注,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,即对不愿惩罚人口贩子而是突出郜艳敏“最美”一面的不满。在很多人看来,尽管处理过程可能需要技巧,但地方政府不能因为郜艳敏的表态而无视自身的责任。

郜艳敏是一个特殊的案例,因为其复杂经历,人们在表态时难免有所保留。这是一个无奈的结局,如同此前有关“对人口贩子一律死刑”的讨论,最后只能寻找到一个折中的处理方式,上一次舆论所呈现的复杂性主要停留在学理层面,如今则用这样一个生动的案例验证了人们的种种疑虑。

郜艳敏的美与难

何小手